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世界新秩序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经济在复苏，国际影响力在下滑；中国经济在减速，但是国际影响力则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秩序确实在变。不过这个变化还在进行中，最终一个新的秩序的基本轮廓出现，大体要等到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也就是2020年左右。

□ 袁　鹏

世界秩序到底变了没有？这是近两年来学界普遍热议的话题。世界秩序确实变了，但是这个变化跟历史上变化的最大区别是，历史上世界秩序的变化都是通过世界性战争实现的，而这一次秩序的变化则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而是通过一个个累积起来的事件逐渐完成的。这一过程始自冷战结束。

世界秩序逐渐变化

冷战结束后，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但事实是，冷战虽然在欧洲结束了，但在亚洲根本没有结束。所以，人们选择用一个保险的提法——“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或秩序。“后冷战”持续了大约20年，出现了“9·11”事件。“9·11”之后大家觉得时代又变了，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秩序真正开始了？因为一度，全球联合反恐代替了大国之间的矛盾或竞争，一个大国合作的新时代似乎正在来临。但实际上，人们最终发现，反恐合作只是大国竞争间短暂的插曲，背后凸显的，恰恰是更深刻的大国博弈。于是，人们又以“后后冷战时代”，来指称“9·11”之后的时代。这表明，旧的时代或秩序并未终结。

2008年比较像一个新秩序的开篇，因为这一年出现了三件足以引起全球格局变动的大事。一是北京奥运，它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二是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它标志着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重新恢复了元气，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三是美国、欧洲等西方世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于是人们又感叹：西方世界整体沉沦，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预示着一个新的秩序真的到来。然而，正在人们谈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时候，美国经济强力复苏，中国经济则出现下滑，到了2014年、2015年，有关世界秩序变迁的争论达到顶点。

2015年出现了几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中欧关系全面升温，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又达成TPP协议。这些事件同样构成世界秩序变迁的一环。总之，美国经济在复苏，国际影响力在下滑；中国经济在减速，但是国际影响力则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秩序确实在变。不过这个变化还在进行中，最终一个新的秩序的基本轮廓出现，大体要等到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也就是2020年左右。届时，中国崛起的态势更加明朗，其他主要力量的分化组合也将更明确。

世界新秩序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全球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个特点是全球性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全球的共同关注，如埃博拉、极地、气候变化等等；第三个特点是世界所有板块几乎同时趋热，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欧盟困境、亚太安全问题；拉美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等。

世界出现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美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崛起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强势外交，中国则认为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或许二者都有，但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不应被指责；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主观的能动的结果。笔者看来，冷战后美国犯了三次战略性错误。第一次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错误地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殊不知冷战结束是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的结果。所以本应该实现美俄和解、共同塑造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美国却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心态对俄罗斯继续围追堵截，最终把俄罗斯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以至于今天，美俄在乌克兰、叙利亚隔空过招。第二次战略错误是“9·11”后，小布什错误地将全球对美国反恐的支持理解为支持他在中东为所欲为，并攻打伊拉克，不负责任地把中东搞得一团乱麻。奥巴马上台后不是反思过错重理秩序，而是选择不负责任地“逃离”中东，以至于今天中东的烂摊子没人收拾并出现中东大规模难民危机。如今，奥巴马似乎在犯美国的第三次重大错误，那就是错误地把菲律宾、越南、日本因同中国的岛礁争端而起的矛盾，理解成亚太国家都欢迎美国来制衡中国。于是，美国以一种“被邀请”的姿态多方抗衡中国，并因此不断放纵日本、菲律宾、越南，导致美中在亚太战略博弈的死结越结越紧。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继续下去，后果将是美国同时与俄罗斯、中国、中东对立，这种局面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亦是灾难。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

中国率先提出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理念。然而，美国囿于霸权思维，不希望有一个大国过早与之分庭抗礼，不愿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不希望中美关系的话语权被中国人所掌握，所以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态度，欲迎还拒，心态复杂。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冷处理就不了了之，相反，要一如既往地推进下去。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华盛顿和纽约，一路走来，始终强调我们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坚持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就有希望。

国际政治

岛礁建设后南海问题的四个变化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关心南海这片海域的安全与稳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依赖南海海域的安全与稳定。中国通过“建设”的方式维护自己合法的海洋主权权益，是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而可信的保障，也是在为地区海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必要的责任和义务。

□ 韩爱勇

为改善岛礁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自去年上半年起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完善了岛礁的相关功能。通过岛礁建设，中国一举改变了南海维权的被动局面，彻底摆脱在南海极为不利的存在格局。随着岛礁建设，南海问题出现四个明显的变化。

南海问题东盟化的趋势已显端倪

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和国际化，一直以来都是一些南海声索国追求的目标。现在，南海问题东盟化的趋势已显端倪。今年8月6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闭幕的东盟外长会议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有7个自然段的文字阐述涉及南海问题的内容，篇幅之大为历年罕见。这表明，南海问题已在东盟外长会议这个平台上“泛化”了，成为东盟外长会议的一个关切议题。客观地讲，中国与东盟之间根本不存在南海问题争端。南海议题之所以登上了外长会议的大堂，除东盟意在向外界表达用一个声音说话以证明自身团结没有问题之外，显然是受到相关声索国的影响。虽然东盟外长会议没有明确提到岛礁纠纷的字眼，而用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表达自己的关切，但这足以提醒我们，南海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绕不开、躲不过的议题。东盟经济上依赖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依赖也使得东盟国家担心会损害自身安全。一些东盟国家在寻求域外国家安全庇护的同时，也在观察中国的行为是否会对地区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南海问题也就成为中国是否秉持“亲、诚、惠、容”周边理念，是否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试金石。

通过双边和平谈判解决与相关国家间的岛礁纠纷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南海问题所引发的地区效应尤其是在地区安全层面的影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2014年中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其中一轨就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这表达了中国履行地区责任的明确态度和诚挚意愿，当然也表明，南海问题的地区效应所带来的内涵上的延展，正重塑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议题。可以判断，这一趋势将随着今年底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成而进一步凸显，此次东盟外长会议声明涉及南海的表述只是这一趋势的预演而已。

南海问题正成为中美之间的议题

美国虽然声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但中国急剧发展的速度显然超出美国的心理预期，美国的霸权焦虑由此而来。怎么办？美国认为需要再平衡。一方面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夯实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以硬实力平衡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尤其是军事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主导地区经济贸易合作进程，即构建TPP，为地区经济合作定规立制。当然，如果中国周边出现安全紧张甚至混乱的局面，使得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周边环境出现不确定性，无疑会迟滞中国发展的步伐。现在南海局势之所出现复杂化，与美国对相关争端口头上不持立场，实际上“介入但不陷入”的做法，助长有关国家继续挑衅中国的底气有着极大的关系。当中国利用强大的建设能力通过岛礁建设一举改变南海力量格局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南海行为规则应该如何制定，南海地区秩序应该如何重塑。

客观地讲，中国在南沙进行的岛礁建设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基础设施工程，符合相关国际法，其他国家可以关注，但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说三道四。美国对于仅仅停留于关注显然并不甘心。10月27日，美方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和坚决反对，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渚碧礁12海里航行。美国的举动，表面上看是以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方式为其亚太盟友撑腰打气，本质上美国是要通过塑造南海新力量格局下的行为规则来维护其作为全球霸主的利益。这反映出，美国虽然对于中国合法的岛礁建设无能为力，但它要护持行为规则制定的垄断权。也可以讲，中美之间不存在南海岛礁之争，但存在南海行为规则的博弈，这也构成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全新元素。

中国捍卫南海权益的决心更为坚定和明确

南海问题争议自上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声索国就南沙群岛问题提出了非法的领土主张，迄至今日形成“五国六方”的复杂局面。中国只有七礁八点可资立足，加上我国台湾地区经营的太平岛，也仅有八个岛礁而已，大部分岛礁被声索国非法窃据。近年来，相关声索国一方面声称注重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不断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完善其对所占岛礁的基础功能甚至是军事建设，加大对相关海域的资源开采力度，力图达到非法侵占的长期化和固定化。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崛起现在正处于将起未起之际，时间不在它们那一边，趁着中国将精力集中于国内发展，利用这一机会窗口，赶紧出手，坐实南海岛礁割据，做足以后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现在的岛礁建设就是极为明确地告诉它们，中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中国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正当权益，更不会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有关行动，是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的正当反应。可以说，中国没有侵略的基因，也绝不会谋求超出合法边界的权益，但中国的存在必需浸透每一寸合法的国土。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也在积极地推动以自己的发展惠及周边国家，中国也认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但如果有国家以为打着“友好、合作”的旗子可以继续损害中国的南海主权权益，显然是打错了算盘，找错了对象。

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方式更加灵活

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南岛的渔民更是将南沙海域称为“祖宗海”，千百年以来，渔民们世代相袭、父终子继以传统渔业生产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南沙群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现在岛礁建设的完成使得渔民的渔业生产更加多元，不仅渔业捕捞拥有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远海渔业规模化养殖也因为有了陆地相关设施的支撑而成为可能。

在和平建设时期，岛礁存在本身就是国家海洋主权权益的象征，同时，维护南海权益方式的丰富还体现在另外三个方面。一是岛礁基础功能的完善，在极大地改善驻岛人员的生活工作条件同时，意味着我们在南沙的民事存在的基础更为扎实。二是岛礁建设以后，为我们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生态保护、气象观测预报提供了现实可能，这些功能彰显的是国家在相关主权海域对合法权利的行使与维护。三是随着岛礁基础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中国为海上搜寻与救助、防灾减灾、打击海盗，为在南海海域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航行安全等地区海洋公共物品的能力会有质的提升，这为中国更好地承担地区海洋的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提供了保障和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关心南海这片海域的安全与稳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依赖南海海域的安全与稳定。中国通过“建设”的方式维护自己合法的海洋主权权益，是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而可信的保障，也是在为地区海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必要的责任和义务。

热点透析

战略视角

缅军方为何愿放松对权力控制



□ 张伟玉

缅甸全国性大选于11月8日举行，据缅甸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缅甸合格选民数有3500万人，参选政党91个，已确定6065人获得参选资格，争夺省邦议会共1163个席位。大选后，军方对民盟胜选后的容忍程度到底有多大？缅甸政局究竟将走向何方？要清楚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追问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缅甸军方为什么愿意放松对权力的控制？厘清这一根本性问题，对判断2015年缅甸大选后军方的行为和底线，以及缅甸政坛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笔者认为缅甸军方利益目标的改变和保障条件的完备是促使和影响其放松对权力的控制的根本原因。缅甸军方的利益目标已从追求对政权的绝对控制转向对政权的相对控制。与维持绝对控制相比，维持相对控制的目标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在保障性条件完备的情况下，极大降低了其追求相对控制目标的风险，从而使其能够获得更大的净收益（收益减成本）。保障条件完备是指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的完备，三者缺一不可。

利益目标发生改变

缅甸军方早已从1988年开始执政时的乱局中走出，逐步稳定和巩固了国内政治局势，这使得军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可不必再以绝对的军事权力和全部的政治权力来维持军事独裁统治。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日益开放，信息的流通速度和能力越来越强大，以主要使用军事力量这样的硬权力为手段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辅之以软权力为手段来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的成本。时代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使用军事暴力的频率也大为降低，而绝对军事独裁统治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最终“翻船”的概率大大增加。

以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为目标的统治，可以通过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来获得国际、国内的道义利益。在国内，释放部分政治空间，可以起到疏导反对派或民众情绪，以及增强军人执政的合法性的作用；在国际上，可以减轻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改善国际环境、获得西方承认和博得政治声誉。因此，维持对政权的相对控制，其统治的韧性要比维持绝对控制大得多。

保障条件更加完备

缅甸军方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等三项保障条件上下足了功夫。这相当于为其目标的实现设定了三重保险，反对派或民众想要迈过这三级障碍，无异于比登天还难，这对维持其相对控制的目标，风险已降到了最低。

在制度保障的建设方面，以2008年缅甸新宪法公投通过为标志，军方建立起以维持政权相对控制为目标的强大制度保障。从开始制定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到2008年公投通过新宪法，军方完成了其制度建设关键步伐。新宪法的修宪程序只有在超过75%的议员同意才能提请修宪，而军方拥有25%的非选举席位，因此可以说军方在修宪等核心问题上拥有“致命”否决权，这在此前昂山素季在总统任职资格问题的修宪中，已经成功实践过一次。与此同时，新宪法还规定，不论是在省、邦，还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状况时，或有将发生此类情况的足够证据时，军队有权依据宪法的规定采取预防、制止和保护措施；如果发生以暴乱、使用武力等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权力或做此种努力，导致联邦分裂、民族团结破裂和国家主权丧失的紧急状况时，国防军总司令有权根据宪法的规定接管和行使国家权力。这两条条款足以可见，军方拥有以宪法为核心的强大制度保障。

在组织保障的建设方面，军方为能把权力移交给可控、可靠的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和扶植 联邦巩固发展协会（简称巩发会）作为拥护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从1997年开始，军政府就把在它控制下的巩发会作为政治外围组织，号召其成员接受系统训练，以为成为下一代领导人做准备，军政府还专门为其制订指导原则，军政府首脑丹瑞大将甚至还亲自兼任过其领导人。巩发会的地方性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除了接受军训以外，还接受系统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训练。巩发会从最初只是从事市政公共工程的“福利组织”，参加筑路、修建医院等义务劳动的协会发展到现如今的巩发党，已然是今非昔比。无论是在基层组织网络，还是组织领导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都非常强大，而作为军方的社会基层组织，巩发党在政治上支持军方，这为军人未来在“民主体制”下争取非军方议席（占四分之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军事保障方面，相对于反对派或民众，军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支撑在其追求对政权相对控制为目标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闪失”和“意外”。军方的军事力量也足以有效威慑以坚持和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理念的昂山素季和民盟以及“手无寸铁”平民。更何况，在紧急情况下，国防军总司令有权根据宪法的规定而接管和行使国家权力。

综上所述，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既有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又有理性基础（相对控制比绝对控制收益更大），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还能带来道义上的收益。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显然是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军方和巩发党在缅甸政坛的关键性角色和核心地位，在短时间和可预见的范围内都难以撼动。